

傅振伦和马克思主义方志学

薛艳伟

提 要：傅振伦是20世纪中国著名史学家，也是中国方志学研究的一代宗师。傅振伦早在青年时期就通过阅读李大钊《史学要论》一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自觉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运用到方志学的研究之中。傅振伦积极提倡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方志学的研究以及在修志工作中贯彻唯物史观。傅振伦对推动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可以称得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先行者。

关键词：傅振伦 马克思主义方志学 唯物史观

傅振伦（1906—1999），字维本，河北省新河县人，20世纪中国著名史学家。傅振伦在方志学、史学史、目录学、档案学、考古学、简牍学、博物馆学、陶瓷史、科技史、民俗学等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考古学家俞伟超称赞傅振伦是“我国近代人文科学发展的同龄人”^①。方志学研究是傅振伦众多研究领域中，最为学界所知和推崇的领域。

中国方志学理论一千余年的发展历程，先后经历了传统方志学、现代方志学和马克思主义方志学三个阶段。宋元以来，不少编者在志书序跋中表达自己的方志见解。明清以来，在方志序跋和书信中探讨方志学理论的现象更为普遍，乾嘉时期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代表着传统方志学发展的顶峰。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学界兴起了研究方志学的热潮。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探讨方志学理论的重要论文，同时出版了多部方志学理论专著，从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方志学理论研究的基础。1935年，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与同年出版的李泰棻《方志学》^②是中国最早的两部方志学理论专著，也同为现代方志学名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第一轮修志开展以来，不少学者提倡将马克思主义与修志工作和方志研究结合起来，开始形成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所谓马克思主义方志学，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方志学以及在其指导下编纂地方志。

需要指出的是，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傅振伦已经开始在方志研究中自觉运用唯物史观。可以说，傅振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先行者，他是最早在方志编纂和方志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学者。1982年，傅振伦出版《中国方志学》一书，该书堪称中国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撰写的方志学理论专著。傅振伦可以说是中国学术界唯一一位在现代方志学和马克思主义方志学两个阶段都有重要方志学理论著作问世的方志学家，并在前后两个时期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因此，傅振伦也被方志界誉为中国方志学研究的一代宗师，在中国方志学界享有崇高的声望。

一

傅振伦接受唯物史观，与他在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读书经历有关。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早在1920年，李大钊就开始在北京大学讲授唯物史观和史学思想史两门课程，

① 俞伟超：《〈文博墓残〉序》，傅振伦：《文博墓残》，中国历史博物馆，1996年，第1页。

② 李泰棻：《方志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

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一次公开走向中国高等学府的课堂。1922年，傅振伦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读书时，当时的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中心。遗憾的是，傅振伦并没有机会选修李大钊的唯物史观和史学思想史课程。等到傅振伦1925年转入北大史学系学习时，该课程已经改由曾经留学美国的陈翰笙讲授欧洲史学史。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史课程主要以欧美史学思想史为主，并编有《欧美史学思想史》讲义。傅振伦虽没有机会亲聆李大钊的教诲，但是他通过购买并阅读《欧美史学思想史》一书了解了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傅振伦晚年回忆说：“惟李大钊先生讲《欧美史学思想史》，我不及听讲，仅从讲义课购得其讲义而读之，始知道了‘历史唯物主义’。”^①可见，这时20岁的傅振伦已经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傅振伦将该讲义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可能是当时国内现存的孤本。

傅振伦系统了解和学习唯物史观是通过李大钊《史学要论》一书。1924年5月，应商务印书馆之约，李大钊出版了《史学要论》一书，该书是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著作。1927年，新河县士绅商讨编纂《新河县志》。傅振伦在《修志刍议》一文中就该县修志制订了一整套程序。第一项是购置必要图书，仅编纂方法类就有3种书，其中就包括李大钊的《史学要论》。^②1930年，傅振伦在《中国史籍分类之沿革及其得失》一文也提到李大钊的《史学要论》：“至若李守常之历史学之分类法（笔者注：见《史学要论》第三章），条理虽甚明晰，惜不合吾国史家体例，难取为法尔。”^③可见，傅振伦很早就注意到《史学要论》一书，并对该书有深刻的认识 and 了解。后来傅振伦对此过程记述道：“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化科学知识的高度概括和结晶。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时，李大钊前辈撰《欧美史学思想史》就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他的名著《史学要论》又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定了基础。”^④

1929年，傅振伦在《编辑北平志蠡测》一文中指出唯物史观对历史学科学化的作用，他认为唯物史观使得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他说：“自唯物史观之说兴，历史始可以一定之法则解释之，而史学遂成专门之学。唯历史之科学化也，则必：第一，须为实录；第二，须注重进化方面；第三，须作真理规律之探求。”^⑤可见，早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傅振伦已经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且认识到唯物史观的巨大影响力。

1944年，傅振伦在《中国史学概要》一书中指出，自古至今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先后出现了4种史观，前3种分别为文学史观、政治史观和伦理史观，最后一种为唯物史观。傅振伦说：“迩来科学日昌，更受西哲唯物史观之影响，历史书事范围，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学术将与政治并重，史观势要须随时代以转移矣！”^⑥傅振伦认为，唯物史观是一种全新的、先进的史观，改变了过去史书记载只重视政治，而忽视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学术等方面内容的缺陷。民国时期，傅振伦主持和参与了《新河县志》《北平志》《河北通志》和《北碚志》4部方志的修撰，并在这些志书编纂中主动贯彻唯物史观的诸多观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唯物史观也迅速占领历史学

① 傅振伦：《蒲梢沧桑九十忆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2页。

② 参见傅振伦：《修志刍议》，《傅振伦方志论著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9页。

③ 傅振伦：《中国史籍分类之沿革及其得失》，《图书馆学季刊》1930年第4卷第3—4期。

④ 傅振伦：《新中国的地方志编纂体法议》，《傅振伦方志论著选》，第311页。

⑤ 傅振伦：《编辑北平志蠡测》，《傅振伦方志论著选》，第120页。

⑥ 傅振伦：《中国史学概要》，史学书局，1944年，第4页。

的各个阵地。傅振伦作为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主动向党组织靠拢。1956年9月，傅振伦向历史博物馆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同年10月，傅振伦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不久，因傅振伦被错划为“右派”，他的入党申请未获批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傅振伦历经磨难，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愈加坚定。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年逾古稀的傅振伦再次提出入党申请。1986年10月，傅振伦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在写给好友李寿彭的信中说：“我于10月17日在馆宣誓入党，还要一年后转正。自当好好学习，为党做些贡献，不负党的希望。”^①因书信具有私密性，傅振伦在给好友的书信中袒露自己入党后的心迹，可以反映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可见，他是真心诚意信仰马克思主义，希望为党的事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1978年，傅振伦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其40多年前的旧作——《中国方志学通论》进行修订，整理为《中国方志学》一书，1982年由河北师范大学方志学讲习班、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和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先后印行学习。^②除此书外，傅振伦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发表大量方志学论文，提倡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修志的指导思想。可见，傅振伦一生都在用唯物史观指导他的方志研究，对推动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

傅振伦认为修志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他说：“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体系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南，也是修志工作的指导思想，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研究社会的历史现象，真实地反映历史面貌，正确地解决志书的内容和形式问题，以及志书的思想性和科学性问题，从而使方志成为真正的科学性史书。当代修志要全面记述一个地区的历史和革命建设等现状，就要求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③傅振伦认为“修志最主要的问题是指导思想”^④，指出方志的编纂者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新修志书的指导思想：“今天我们修志应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编写新志，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实事求是地记善记恶，而侧重在记述正面的事实和人物，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借鉴。”^⑤又说：“我以为我和旧志的编纂者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以唯物史观作为修志的指导思想。”^⑥傅振伦继而将唯物史观作为新方志和旧方志的分水岭。他说：“我认为现代方志与古代方志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指导思想上，真正的现代方志应始终地贯彻唯物史观思想，尊重史料、尊重真实、尊重科学方法，把方志撰述作为对真理的探求。”^⑦

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阶级斗争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傅振伦自觉将唯物史观的这些基本观点运用到方志

① 李寿彭：《傅振伦及我们间的交往》，南宫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南宫文史资料》第4辑，1992年，第173页。

② 参见傅振伦：《中国方志学》，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4年；傅振伦：《中国方志学》，河北师范大学方志学讲习班，1982年；傅振伦：《中国方志学》，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2年。

③ 傅振伦：《新中国的地方志编纂体法议》，《傅振伦方志论著选》，第311页。

④ 傅振伦：《谈编修新方志的几个具体问题》，《中国史志论丛》，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7页。

⑤ 傅振伦：《〈史通〉对当代编纂新志的启示》，《福建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1期。

⑥ 林在勇主编：《傅振伦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7页。

⑦ 林在勇主编：《傅振伦学述》，第119页。

研究之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形成和发展。他在自己的多部论著中对此作了不同程度的阐释：

其一，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其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以及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都有反作用。马克思主义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重视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并认为不同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形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要求修志者必须重点记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革以及经济生产活动。中国古代社会所修志书虽然设有物产、赋役、食货等社会经济门类，但是，其主要着眼点是要确保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满足贵族官僚的物欲需求，对基层社会的经济情况语焉不详，而且所占篇幅极少。方志中占篇幅比例最多的是以记述士绅官僚为主的人物志、古迹志、艺文志等门类。

民国以来，随着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过去不重视经济的陈旧观点有所改变。傅振伦指出：“唯物史观认为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方志记述政权、司法、党派、兵役、宗教、学校、文艺、思想等上层建筑发生、发展的历史时，不能离开对经济基础的研究。必须从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中寻求科学的说明。既要收集社会经济资料，还要收集天文、气象、地理、物产、资源等自然界物质资料。”^① 其实，傅振伦早在民国时期所拟的各志书篇目中，就非常重视记载经济方面的内容，有的明显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傅振伦明确说自己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他在《编辑北平志蠡测》一文中指出：“居今修志，应加改革。宜除道德之空谈，侧重于物质方面。自马克思唯物史观表扬于世以来，而‘社会嬗变（社会之嬗变，即人类之历史），恒视经济之变更为转移’之理大明。故欲阐明事理，须求当代经济状况。今后必加详于地理之自然资源、人文地理以及扩充旧日史志食货门类目，诚当今修志之要义矣。”^②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傅振伦主张修志要特别侧重记载物质方面的内容，并在所修志书中对社会经济予以极大关注。1927年，傅振伦主持编纂的《新河县志》于食货门下设社会经济部分，其中的“农村经济”分为生产、交易、分配、消费4个方面。朱希祖评论《新河县志》说：“条目分明，而能注意经济及社会等诸方面，是其特色。”^③ 1929年，傅振伦在《编辑北平志蠡测》一文为《北平志》提出的篇目设计中，在风土考现代风俗门下设“社会阶级”，在社会概况门下设“社会经济”，傅振伦又将“社会经济”分为生产、消费、交易、分配4章。1933年，傅振伦为河北通志馆草拟的篇目中，民生略下设的社会经济门包括生产、交易、分配、消费4个方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认为社会再生产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4个环节，这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可见，傅振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有深刻的认识，并在修志实践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

1956年，傅振伦《整理旧方志与编辑新方志问题》^④一文所拟的新方志篇目第3编为原始社会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指出，在编纂这一编时应“特别着重于地方劳动人民生产发展的历史、革命斗争的历史，应当反映出符合当地历史的爱国主义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历史”。

① 傅振伦：《中国方志的发展与前瞻》，《史学月刊》1985年第1期。

② 傅振伦：《编辑北平志蠡测》，《傅振伦方志论著选》，第120页。

③ 傅振伦：《先师朱逋先生行谊》，《文史杂志》1945年第11、12期合刊。

④ 傅振伦：《整理旧方志与编辑新方志问题》，《新建设》1956年第6期。

史,包括文化上的一切成就”。该编的第2部分为“社会经济与文化史”,他对此加以说明:“没有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就不能理解地方文化的发展,今先叙述社会生产关系、农工劳动生产工具及农工生活,次述科学技术、文艺等创作,附以古迹、古物。”傅振伦在《方志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一文指出:“唯物史观认为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方志要首先体现当时各个时期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记述政权、司法、党派、兵役、宗教、学校、文艺、思想等上层建筑发生、发展的历史时,不能离开对经济基础的研究。仅从意识形态、政治斗争中寻找上层建筑发生变革的原因是不够的,必须从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中寻找科学的说明。修志必须多方搜集社会经济资料和自然界物质材料,天文、气象、地理、物产资源。”^①可见傅振伦认识到,新志的编纂不仅要特别重视记载有关经济基础方面的内容,对于上层建筑方面的内容亦不容忽视。

志书是否记述经济基础,成为傅振伦评论一部方志优劣的标准之一。如新修的《五台县志》用了大量笔墨记载经济方面的内容,傅振伦称赞说:“社会上层建筑的基础是经济,今天突出这一重点,写成二十万字的十五个专志,约占全书篇幅的42%,为四化提供了充足的材料,实为可贵。”^②他称赞《哈密县志》的第二个优点说:“经济是社会上层建筑的基础。新志既以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列于篇首,又以农林牧副渔、国计民生、食货等为重点,记载独为详悉,且列于政治之前,颇具远识。它能为当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科学依据的基本情况,以利于本地各级领导和主管部门从实际考虑,做出相应决策,这是很有用的书。”^③他称赞《临安县志》的第四个优点说:“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也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及其变革。上层建筑的各种形式,在本质上都取决于它的经济基础……因此本志亦特重经济、农工财货,列于政治、文化、社会之前,且特别详悉,先述生产关系变革,说明生产发展的缘由……本志列‘自然环境’,位于‘经济’诸篇之前,深有得于马列主义之精义。志裨实用。”^④在傅振伦看来,新志记载经济方面的内容,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有利于国计民生,而且体现出方志实用性的特点。

其二,唯物史观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只有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在纷繁复杂和扑朔迷离的历史现象中认清事物的本质。方志具有阶级性,方志的编纂都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方志记载阶级社会的历史,如果不用阶级斗争的观念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记述和分析,就会出现判断不清事物的性质或是非颠倒。傅振伦指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贯穿于经济、政治、思想的各个领域。旧有方志或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略而不谈。名宦、乡贤等传,片面地反映了他们的功绩;事纪、兵燹、武功等门或传,斥农民起义为贼为寇。说明了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思想和行动都体现了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现在必须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关系,去分析复杂的社会现象。对阶级斗争以至道德、宗教、哲学、艺术等观念体系,要认清本质,寻求社会发展的规律。”^⑤

傅振伦认为新修方志“要有鲜明的阶级性”,他说:“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动力之一。所以,新志对于有阶级性质的社会矛盾,必须坚持马列主义阶级

① 傅振伦:《方志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山西地方志通讯》1982年第9期。

② 傅振伦:《〈五台新志〉读后》,《山西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5期。

③ 傅振伦:《〈哈密县志〉序》,哈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哈密县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页。

④ 傅振伦:《〈临安县志〉序》,临安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临安县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2年,第3页。

⑤ 傅振伦:《新中国的地方志编纂体法议》,《傅振伦方志论著选》,第314页。

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新志必须肯定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对领导人物或个别历史人物的作用，也要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旧志列传中的名宦、乡贤、忠烈、武林等，应当扬弃其歌颂统治阶级、压抑人民的因素，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作新的评价。”^① 傅振伦认为新志应当为人民群众服务和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他说：“新中国也应当创修新方志，以服务于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为了发扬人民爱乡土、爱国家的精神，激发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必须及时编辑地方志书，用以教育人民，教育后代。因此，方志实为政治教科书之一。”^②

但是，傅振伦同时指出，人类社会是极其复杂的，即便是在阶级社会，也不能把所有的人类活动全部纳入阶级斗争的范畴。他举例说，像语言文字这样的人类交往工具就不是属于某个特定阶级的，其他如人类共同创造的文化科学知识、人类共有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以及社会伦理、公德、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人的性格，以及偶发事件对历史的影响等现象并不都具有阶级属性。我们仅可说，阶级关系是阶级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阶级斗争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他认为，在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能强调和扩大阶级斗争，修志者也应该做到“遇事要实事求是地作具体分析，应力避简单化、公式化或概念化”^③。可见，傅振伦并不认为阶级分析的方法是万能的，需要辩证对待阶级斗争的观点。

其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中国古代的官修方志基本都由官僚士绅主纂，编纂者基于唯心史观，替统治者歌功颂德，使旧志成为以帝王将相和官僚、地主、士绅等上层社会人物为中心的志书，污蔑农民起义军为盗为匪为贼为寇的历史文献。傅振伦深刻认识到旧志的这个局限性，指出“方志也是为阶级服务的学科”，封建社会所编纂的方志是“地方官吏统治人民的一种法宝”，旧志“歌颂反动统治阶级，宣扬旧礼教、旧制度，以蒙蔽人民、欺压人民，而巩固其政权”^④。他批评旧志的缺陷：“每部方志不过是略书州邑废置的时代，城池营缮的年月，钱粮赋税的数目，兵丁员司的定额，再拼凑一些选举人表、官师事绩、邑宦事绩、节妇事略、例行典礼、庸滥诗文、妄诞星野、无谓八景，东鳞西爪，毫无联系。”^⑤ 傅振伦提出当代修志编纂要克服这个缺陷，新志要充分体现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说：

历史不是帝王将相、民族英雄的历史，而是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是劳动群众的历史。方志也是这样。历史和方志都应当是正确反映人类社会客观发展的科学。它的宗旨是研究人们物质、社会和精神生活基础的规律，从社会生活现象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制约中，研究社会发展的整体。这样的研究，只能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观点、立场和方法。历史和方志的内容应当是倾向性明显，态度鲜明，主题现实，具有高度思想理论水平。我们要厚今薄古，要歌颂劳动人民，要实事求是。我们要依据这种精神，“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完成人民大众所需要的新型方志。^⑥

① 傅振伦：《中国方志的发展与前瞻》，《史学月刊》1985年第1期。

② 傅振伦：《中国方志学》，《傅振伦方志论著选》，第81页。

③ 傅振伦：《新中国的地方志编纂体法议》，《傅振伦方志论著选》，第314—315页。

④ 傅振伦：《中国方志学》，《傅振伦方志论著选》，第14页。

⑤ 傅振伦：《整理旧方志与编辑新方志问题》，《新建设》1956年第6期。

⑥ 傅振伦：《中国方志学》，《傅振伦方志论著选》，第81页。

傅振伦认为新型方志应当歌颂人民群众,编纂人民群众的历史,并最终为人民群众服务。他说:“历史也好,方志也好,它是人民的历史,是集体智慧的历史,新修方志一定要生动地反映出来。”^①又说:“新方志的内容当以人民群众的活动为主。旧志夸大了圣君贤相、超人英雄的历史作用,是错误的。新方志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重新审视历史,评价历史,肯定、颂扬有贡献的历史人物,揭露、批判危害人民的人物。要为农民领袖、革命烈士、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和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科学家、文史哲学等著名人物树碑立传。下至昔日视为‘小人物’的‘细民’,只要有功于国家和人民,就要入志。”^②

关于人物志的立传原则,古代的修志者多以事功和德行为立传标准。傅振伦认为只要有功于国家和人民,对推动社会前进做出贡献的人物,无论其职位高低,都可以为其立传。具体来说,立传的范围包括:“政治、军事、外事上的革命领袖、领导干部,战斗英雄、殉国殉职的烈士、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以及财政经济、农林水利、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科学技术、医药体育、工艺美术、文艺工作等知名人士,社会贤达、爱国侨胞之热心公益者,民主人士、宗教领袖、少数民族代表,下至能工巧匠、民间艺人、演员拳师、烹调厨师等。”^③傅振伦提出的这个立传范围十分广泛,既有上层社会人物,也有各行各业的社会精英,也不排除能工巧匠、民间艺人、拳师、厨师等以往不入修志者视野的社会底层人物。傅振伦力图改变过去方志基本只为上层社会精英树碑立传的惯例,反映了傅振伦向下看的观念和尊重人民群众作用的思想。傅振伦强调“革命领袖在方志人物志中应占首要地位”,而且应当为革命领袖设立专传。同时,傅振伦也主张为小人物立传。他说:“今修新志不仅要记载声名显赫的人物,也要注意默默无闻、有益于社会的所谓小人物。如拳师力士、杂技、马戏、音乐歌舞、体育文娱、民间技艺、文艺工作者,旧入艺术方技,今当一一入传。立传不在职位的高低,职高位显而碌碌无能、无所建树者,不应虚占方志的篇幅。”^④

傅振伦主张新志立传要体现人民性,“不应以官职高低为立传标准”,要体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⑤在中国古代皇权专制社会,人物志编纂的目的无非是为官僚地主树碑立传和歌功颂德,同时宣扬列女、孝义等维护儒家伦理道德的事迹,最终都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政权的长治久安和巩固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傅振伦认为当代编纂人物志的目的是“为了反映历史真实情况,寻求事物发展规律,以服务于四个现代化建设”。新修的人物志应当歌颂人民、民族英雄和革命烈士,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爱乡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鼓舞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斗志。^⑥因而,傅振伦认为古今修人物志的性质截然不同。

傅振伦认为方志的人物传“要体现人民性”,需要做到三点:第一,“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把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显示出来”;第二,要表扬那些为人民作出过贡献的历史人物,要充分体现出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和人民群众评说千秋功罪的神圣权利;第三,要“大力宣扬人民群众的新风尚、新道德、新发明和创举,表现人民群众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真实过程”。^⑦傅振伦指出修志要突出人民群众的作用,《商丘县志》大量记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

① 傅振伦:《司马迁是怎样编写〈史记〉的》,《陕西地方志通讯》1982年第3期。

② 傅振伦:《新中国的地方志编纂体法议》,《傅振伦方志论著选》,第313页。

③ 傅振伦:《论人物志的编撰》,《中国地方志》1986年第5期。

④ 傅振伦:《论人物志的编撰》,《中国地方志》1986年第5期。

⑤ 参见傅振伦:《新中国的地方志编纂体法议》,《傅振伦方志论著选》,第314页。

⑥ 参见傅振伦:《论人物志的编撰》,《中国地方志》1986年第5期。

⑦ 参见傅振伦:《新中国的地方志编纂体法议》,《傅振伦方志论著选》,第314页。

民军队在商丘地区对日军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英勇斗争，他评价道：“新志对人民军队在商丘的重要战斗都做了较详尽的叙述，使人信服地认识到，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就没有新中国。”^① 傅振伦主张新志要注重记载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至若抵制海外，如义和拳、红灯照以及日本侵略军残暴与我忠勇军民事迹，亦应浓笔重彩，详加阐述。”^② 对旧志污蔑农民起义的地方，傅振伦提出严厉批评。民国时期，清朝遗老冯煦所修《金坛县志》“附录咸丰六年及光绪末农民义军等事，称为乱贼”，傅振伦认为冯氏此举“尤属措辞不当”^③。傅振伦认为评价历史人物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要观点鲜明和爱憎分明，对旧王朝的让步政策、清官的德政问题、贼寇问题等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去评价。^④ 总之，傅振伦认为修志要充分体现出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并且要站在人民的立场去评价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

三

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概念的是梁寒冰。1981年4月22日，梁寒冰在中国地方志规划会议上发言时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迄今已有六十余年之久；而马克思主义方志学尚处于草创时期。”^⑤ 梁寒冰要求中国的方志研究者：“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吸收和改造前人修志的经验和思想资料，总结我们修志的实践经验，使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建立方志学的新理论。”梁寒冰最后呼吁“要建设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理论”。梁寒冰无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方志学最早的倡议者之一。梁寒冰是中国地方史志协会首任会长，并且长期担任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副组长。20世纪80年代，梁寒冰组织指导了全国范围内的第一轮修志工作，他对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多方呼吁和倡导，引起了中国方志学界讨论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热潮。

20世纪80年代以来，傅振伦也在各种场合利用各种机会积极提倡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方志研究及修志工作。傅振伦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工具。他说：“新中国的社会科学家首先一定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马列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作为科研或工作的利器。”^⑥ 傅振伦一再强调史学家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学习马列主义，以适应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从事科学研究必须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站在人民的立场，才能有较大的成就。”^⑦ 傅振伦指出，在当代中国的方志发展事业中，最为急迫的是建立马克思主义方志学。他说：“最重要的是，今当总结多年来积累的宝贵经验，并吸取前人留下的地方志学思想资料 and 思想内容，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上升成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马列主义崭新的方志学理论，用以指导今后的修志事业。”^⑧ 傅振伦在为林衍经《方志学综论》所作序文中指出：“当前方志界的主要任务：一为整理旧志，批判继承；二为编纂新志，服务于两个文明的建设；三为探

① 傅振伦：《一部突出商丘历史文化名城特色的新志书》，《中国地方志》1992年第3期。

② 傅振伦：《志坛一奇葩：评〈王庆坨镇志〉》，《天津史志》1996年第4期。

③ 傅振伦：《金坛县志简介》，《金坛文史资料》1985年第2期。

④ 参见傅振伦：《论人物志的编撰》，《中国地方志》1986年第5期。

⑤ 梁寒冰：《梁寒冰同志的讲话》，《中国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3期。

⑥ 傅振伦：《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卷，第131页。

⑦ 傅振伦：《学习的回忆》，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5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351页。

⑧ 林在勇主编：《傅振伦学述》，第135—136页。

讨新方志理论，建立马列主义的方志学。”^① 傅振伦在荥阳方志学术报告会上说：“我们要建立马列主义新方志学，什么是马列主义新方志学：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继承旧志的优良传统来进行创新。”^② 傅振伦指出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修志的基本精神和要求为：“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研究社会的历史现象，如实地反映历史面貌，正确地解决志书的内容和形式问题，从而使地方志书成为真正的科学性史书。”^③ 傅振伦是中国方志学领域的泰山北斗，经他一呼，响应者无数。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对新时期方志学理论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结 语

总之，傅振伦在青年时期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他自觉在方志研究和方志编纂中吸收了唯物史观的思想精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傅振伦迎来他方志研究的第二个高峰期，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编纂的方志学专著——《中国方志学》，并写作了数百篇方志学方面的论文。当时正值第一轮修志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但是由于缺乏如何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修志的理论著作，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方志学界对于修志理论的需求如同大旱之望云霓。傅振伦的《中国方志学》一书和其他论文的问世正逢其时，解决了全国各地修志同仁对于方志理论的急切之需。因此，说傅振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方志学的先行者，甚至开拓者是当之无愧的。

（作者单位：晋中学院政治与历史学院）

本文责编：詹利萍

民国《丰南志》点校本出版发行

2018年3月，由黄山市徽州区地方志办公室点校整理，黄山书社出版的民国《丰南志》点校本正式出版发行。《丰南志》是徽州区迄今发现并被《中国地方志集成》辑录的两部乡镇旧志之一（另一部为清代《岩镇志草》），20世纪30年代末西溪南村（旧称“丰南”）人吴吉祐编纂，内容包括舆地、人物、选举、艺文、杂志等共10卷，全书50余万字，较为详实地记载了唐宋以降特别是由明迄清西溪南一地的自然、人文、社会诸方面历史，记述全面、内容丰富，极具史料价值。该旧志的点校出版，对发掘和弘扬徽州历史文化，促进西溪南镇旅游开发，打响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传统村落、安徽创意小镇等品牌，都有着重要意义和影响，对徽学和地方文史研究也大有裨益。

（黄山市徽州区地方志办公室 吴晓春）

① 傅振伦：《〈方志学综论〉序》，林衍经：《方志学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页。

② 傅振伦：《中国方志学家傅振伦教授在荥阳方志学术报告会上的讲话》，《开封市志通讯》1984年第3期。

③ 傅振伦：《新中国的地方志编纂体法议》，《傅振伦方志论著选》，第319页。